

透过“吻”增长来“问”增长

本报评论员

面对国家发改委核准的钢铁项目批文，湛江市长王中丙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激情一吻，不仅成就了一张经典的新闻照片，也让“稳增长”这个中国经济的关键词派生出“吻增长”这个颇具特色的称谓。

当下，中国经济的确没有以前景气，地方政府争取到大投资项目的确不容易。王中丙那发自内心的公开一吻，也能够得到人们“同情的理解”。至少，王中丙打破了中国官场“说一套，做一套”的潜规则，相比那些开会时大讲特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、实际上唯GDP马首是瞻的官员，王中丙无疑要诚实得多。“吻增长”貌似由王中丙一人表演，却曝光了中国官员的集体情结。

增长当然重要，也值得一“吻”。但是，如何确保“吻”得健康美好，而不至于在狂热的非理性中“吻”出岔子，甚至感染病菌，却需要认真思量对待。正所谓“思而后行”，在行动之前最好多问几个为什么。对于“稳增长”，我们有必要追问、拷问甚至问诊

一番，将几个重要问题考虑清楚。

问题之一：对于经济的下行压力，我们是不是反应过度了？中国经济下行的所有表征归结到一点，就是2012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增速降至8.1%。于是，“硬着陆”的担忧情绪上升，股市也走出一波下跌行情。

相对于中国前几年10%左右的经济增速，8.1%这个数字的确不太好看，但放眼当今世界，8.1%依旧处在领跑的位置，无论欧美国家还是“金砖”其他国家，其经济增速都比中国低。因此，我们没有必要过于担忧。即使未来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下行，我们也不必自乱阵脚。根据“十二五规划”，2011年—2015年，中国年均经济增速预期为7%，这是经过各方充分讨论过的战略预设。当前中国经济减速，既有内外形势不乐观的因素，也有中国政府主动转变增长方式的因素，对此我们应多几分冷静和淡定。

问题之二：为了实现增长目标，政府的手段选择是不是带有短期化和功利化的嫌疑？自从温家宝总理提出“要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”以来，国务

院各部委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”，纷纷高调出台稳增长的措施，有吸引民间投资，有补贴节能家电消费的，有加快基础设施项目审批的……凡此种种，固然显得果断高效，却也给人以“一窝蜂”赶场之感。

很多措施，比如吸引民间投资，本来就是市场化改革的应有之义，甚至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所在，可是一些部门却把它视为阶段性的救急辅助工具，或用或弃；再比如扶持节能家电行业，这也是顺应“低碳经济”发展趋势的举措，理应纳入全面规划的长期战略，而不应停留在非常时期刺激消费的小算盘层面。设想一下，如果通过上述措施，最终使得2012年全年经济增速收获了一个好看的数据，这些措施中合乎市场经济的精髓部分，未来还会继续坚持到底吗？从目前的施政逻辑看，恐怕还不能打包票。

问题之三：“GDP崇拜”主导的增长路径依赖，是不是要借机延长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？投资、出口和消费是拉动中国增长的“三驾马车”；三者之中，投资超强，出口较强，消费极弱。如此不平衡的增长格局持续多年，在中国人口红利没有耗尽且资源环境压力可控、欧美日各国经济不错且进口旺盛的岁月，尚可勉力维持。如今，中国人口红利告罄，资源环境压力接近极限；欧美日经济不振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，在此背景下，中国经济转型迫在眉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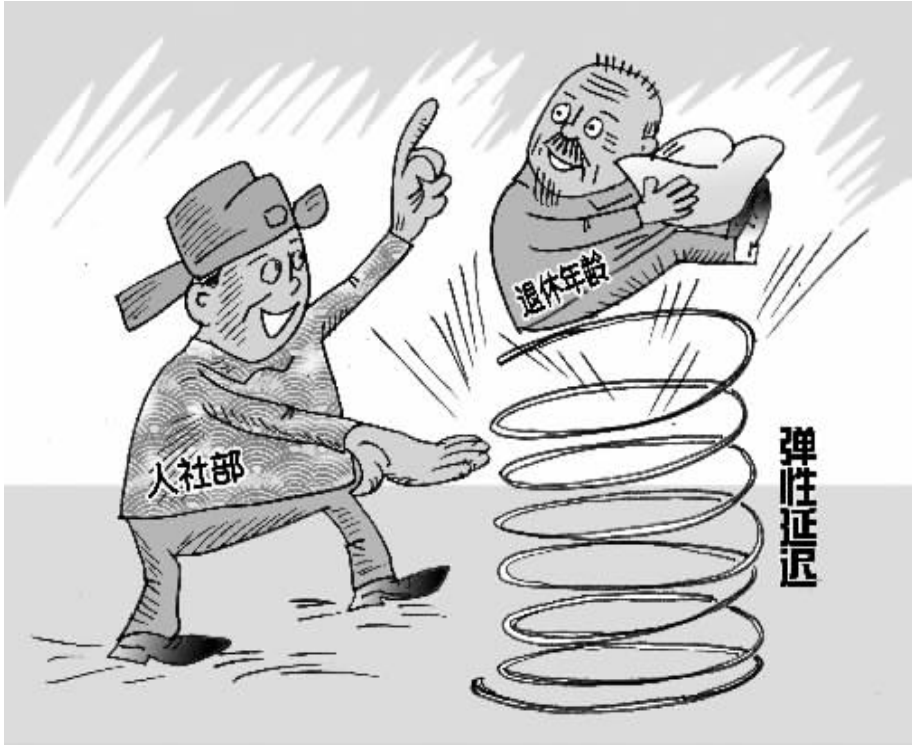
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，经济要转型已成为国人共识，治理“三驾马车”的失衡格局也初见成效。然而，“GDP崇拜”依旧在不少当权者头脑中盘桓不去，倚重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固有模式

依旧被他们奉为主臬，至少是重要的备用手段。这种路径依赖，已经在2009年被“四万亿刺激计划”强化了一次，目前，不排除它将被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再度强化的可能性。如果这种轮回果真上演，固有的增长模式就有可能演变成一种“超稳定结构”，从而赋予路径依赖以更长的存活时间，这显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图景。

问题之四：稳增长的根本目的到底是什么？经济活动以人为本，经济增长亦当以增进人的福祉为根本目的。在中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，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被庸俗地理解为实现一个亮丽的GDP目标，官员的政绩考核也以此为核心指标。这种搞法，使得貌似快速的经济增长，在扣除环境污染、资源透支、通货膨胀、房价畸高等负面因素后，并没有给民众留下多少“正福利”。真正受益的是少数人，其主体结构便是某些借助漂亮的GDP数字升迁的官员，以及与官员沆瀣一气的权贵资本主义群体。

显然，经济增长要“稳”，首先其目的要公平正义，即必须以提升全体国民的福祉为依归。否则，经济越增长，社会越撕裂，这样的增长不可能真正稳定，更不可能维持久远。遗憾的是，这种理念并没有很好地落实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。

也许还可以继续问下去，但这四个问题，已经大致涵盖了针对稳增长的所有问题的主要方面，需要王中丙们予以思考和回答。考虑到忘记常识、知行分离是中国当权者的老毛病，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计，透过“吻”增长来“问”增长，给有关方面提个醒，当属必要之举而非多余之虑。



人社部将建议弹性延迟领养老金年龄

退休年龄或后延，民众关注养老钱。平均寿命在增长，弹性退休将实现。社保规划待统一，养老制度或偏见。少壮努力干事业，晚享幸福享天年。

唐志顺/漫画
孙勇/诗

涨跌停板的另一面：金字招牌和保护伞

翟恒山

中国股市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投机现象，资金热衷于炒新炒小炒差，热点题材满天飞。笔者认为，这与中国股市的制度性缺陷，特别是股市交易制度没有与时俱进加以改革，而是继续保持着最保守的10%的涨跌停板制度有很大的关系。设立涨跌停板制度，股市投机波动的幅度表面上是缓和减小了，但实质上却是将问题向更高级形式发展，更加顽固难治。这主要是因为涨跌停板制度有两大弊端，即上涨趋势时的“金字招牌”作用和下跌趋势的“保护伞”作用，使股价不随业绩增减而波动，而被拥有巨额资金的机构和庄家轻松地利用，实现了他们的操盘意图。

中国股市拉升向上的投机操作，重点表现的是形形色色的强势股。所谓强势者，一是要成交量放出和大资金的参与，二是要技术图形完美和霸气十足，更要有涨停板这块金字招牌，才能吸引各路资金和中小散户的跟风操作。这里我们举浙江东日股票

为例，该股业绩一般，也缺乏成长性，但因该上市公司参与投资了温州银行5.17%股份的金融改革题材而受到追捧。3月29日受消息刺激，一字涨停，成交量放出，在4月26日停牌前的16个交易日中累计拉了11个单日涨停，在4月13日股价创出历史新高、没有套牢盘压力后又拉了2个涨停板，总涨幅达到了219%。如此巨大的财富效应，怎能不进一步加大“散户公开化和跟风普遍化”的投机氛围呢？相反，取消了涨停板，股价一步到位，上述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。

而在股价下跌趋势形成，大大小小泡沫需要刺破时，对一个投机市而言，资金量最需要的是逃顶做空，夺路而走，避免损失。按说中小资金船小好调头可以抢先抛售，然而跌停板制度却成了天然的“保护伞”，让大资金和庄家能在个股中巧妙布局，安全撤退，把跟风买进一般投资者高高套在最高位。在此我们举今年最震惊股市的重庆啤酒为例，在2011年11月27日利空突发，

机构即引爆了连续9个跌停板，每天以数千万股封单牢牢压在委卖1上，使所有前期参与的投机资金无法出逃，直到12月21日开盘撮合成交了2000万股，市场情绪开始躁动，由于私募基金的参与，机构又上演了一出以最低价20.16元到最高价40.88元的放量震荡大戏，在2012年的一季报中，大成基金和私募基金的身影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总之，大机构大资金不以真实的业绩成长来价值发现和合理配置资金，而是以业绩悬在天上的题材和超跌反弹的技术要求，操纵股价、制造泡沫、获取暴利，跌停板制度在这里扮演了十分突出的助射为虐的角色。

欧美股市是不设涨跌停板的，这使他们的股市交易和企业文化相对成熟稳定，达到小泡沫不断破裂，大泡沫就不易形成的效果。有些人常会不明白地问：为什么欧美宏观经济发展停滞、政府债务亏空严重，他们的股票仍能保持上涨趋势呢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一是上市公司非常注重和保持业绩的成长性，二是股市交易相当注重价值投资，使股价始终维持在较低的市场市盈率和市净率。美联

储主席伯南克对美国经济复苏乏力、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一直忧心忡忡，并在其间走钢丝似地推行货币政策，但对股市最近却公开赞扬鼓吹：“标普500指数今年迄今上涨了12%以上，创1998年以来同期最好的表现。标普500市盈率是14.3倍，比1954年以来的平均值低13%。”而欧元区政府债务亏空严重，拖累了银行业，但他们的市盈率和市净率早就落到了10倍以下，这就不会再大影响整体股市的稳定走势了。再例如日本股市交易原来是有涨跌停板限制，日经225指数一直居高不下，后来东京股票交易所取消了这个制度，结果日本最后一家计算机内存芯片厂商高尔必达公司，由于连续5个季度亏损，于今年2月27日向东京地方法院提交了破产申请的消息曝光后，在29日的交易中竟然大跌了97%，从28日的收盘价254日元一度跌至4日元，由此可见新交易制度刺破股价泡沫的能量和威力。

当然任何交易制度都可能是一把双刃剑，各有利弊，取消涨跌停板制度对股市的长期稳定发展肯定是有利的，但也增加了短期风险，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。

■闲岩碎屿 | Fang Yan's Column |

一位镇干部眼中的拆迁难事



方岩

朋友老王自扬州来，前几年弃商从政，现担任一城郊结合镇的副镇长，闻名遐迩的瘦西湖，就有一部分属于他的“势力范围”。作为一个经济较为发达城镇的干部，老王对现在居住宽敞、家有美妻娇子的生活状态颇为满意，不过谈及工作，却也有不少烦心事：现在做基层工作，计划生育都不是难事，难的只有两桩：一是招商引资，二是拆迁。”

八小时之外图景

为了把当地经济搞上去，老王每年有数亿元的招商引资任务，不得不频繁游走于珠三角、浙江、上海等富庶地区，这是他近年第四次到深圳与潜在的投资举行“双边会谈”。

不出差的日子，老王下班之后，通常不直接回家，也不是去应酬，当然也不是在回家或者去应酬的路上。随着城市的快速延伸，我们这个处于城郊结合部的城镇俨然成了大工地，每天下班之后，我都得去做拆迁户的工作。”老王为我们揭示了八小时之外的工作图景。

作为苏中重镇，扬州近十年GDP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速，城市化、工业化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，老王所在的城镇自然成为拆迁“重灾区”。为此，老王每年要负责联系二三十位拆迁户，做他们的思想工作。

其实近八成拆迁户都是比较好说话的，等那些不太好说话的，就得多想些办法。”老王给我讲起自己的工作心得。

老王的计谋与法宝

我知道，老王是一个颇有计谋并讲究策略的人。十年前，来自农村的他在扬州某商场当售货员，是个不折不扣的“螺丝男”。不过，他还对同在商场工作的一位“白富美”发起了强大攻势。某天上班时，老王躲在僻静之处，等意中人停好自行车并离去之后，他就把自己的“座驾”贴过去，用锁链把两辆自行车锁在一起。临到下班时，意中人急得团团转，老王满脸“歉意”，解开链条并担当起护花使者，一来二去，就演绎了真实版的青蛙王子故事。

与拆迁户谈判，老王最大的法宝就是软磨硬泡。“我晚上就守在拆迁户家里，和他们谈心、神侃，经常一坐就到半夜12点，当拆迁户哈欠连天时，往往就是接近谈判成功的时候。”老王颇为感慨地说，最近的一次，我和拆迁户谈到凌晨5点，才最终达成协议！”

对于不太好说话的，就得更得多想一些办法。“一方面动用各方面关系，寻找有说服力的中间人，另一方面还是要打疲劳战。”老王介绍说，他经常连续几晚造访同一个拆迁户，主人不胜其扰、疲惫至极，只好“缴械投降、签字画押”。

当然，在拆迁过程中，老王也会遇到一些软硬不吃钉子户。对待这些人，你们会不会动用警力直接强拆？”对于我的疑问，老王连连摇头。

“去年国务院颁布新的拆迁条例，取消了行政强制拆迁。应该说，这个条例对于遏制地方政府暴力拆迁是有积极意义的。但是对于我们基层工作人员来说，与拆迁户的谈判越来越难了，一些拆迁户索性漫天要价。”老王感慨道。

据说，这个条例对于遏制地方政府暴力拆迁是有积极意义的。但是对于我们基层工作人员来说，与拆迁户的谈判越来越难了，一些拆迁户索性漫天要价。”老王感慨道。

据老王介绍，他最近就遇到一位不太好讲话的袁姓拆迁户。前段时间他与袁先生谈了几次，没谈拢，后者索性跑到北京旅游了个月。正在说话间，袁先生给老王发来一条短信：“我是一个死心眼的人，从今以后我会住在这里，你们来强拆，直接把我压死吧。”

你们一定是把对价压得很低，让人难以接受？”对于我的质疑，老王连忙解释道：“其实这是一位违建户。前几年他向村里提出盖房申请，核定的建筑面积为70多平方，但他在夜间偷偷施工，把房子往上加高了一层。目前他的房屋面积接近200平方，即便不追究违建一事，我们也只能补他2、3套住房（约200-300平方），但他开口就要补偿7套房！”

老王说，他们理解拆迁户的想法与诉求，不过，如果对方一味狮子大开口，必然会加大谈判的时间成本，进而会影响整个城市的更新与建设进程。“新拆迁条例规定，拆迁户超过规定期限不搬迁的，由政府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这似乎是鼓励官告民，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一些难度。目前拆迁维稳是地方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，哪个领导愿意被贴上强拆的标签呢？”

求解难题冲刺诺奖？

老王坦言，政府与拆迁户，很容易给人定位为强者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博弈，这也是千百年来中国官民关系的真实写照。但是作为一名基层工作人员，我们要面临来自上级部门与老百姓的双重压力，个中辛苦不足为外人道，因此我们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。”

我们该如何破解当前的拆迁困局呢？老王建议，各地应成立独立的评估机构，专门对拆迁户的住房土地进行客观、合理评估，拟定补偿方案，这个机构应该由律师、会计、评估等专业人士组成，同时也要接受具有公信力与影响力的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等民间人士监督。如果真有这样的机构，在正式动工前就公布各家各户的补偿方案，做到信息的完全公开，就能消除信息不对称，从而避免老百姓的互相攀比心理，那么我们的谈判效率就会因此大幅提高，拆迁就不再是一件难事了！”

近年来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城市化、工业化进程日益加速，加之连通经济发展血脉的高等级公路、铁路不断延展，拆迁已成为各地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突出问题。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，由于社会利益日益分化，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，客观上导致了较为严重的社会对立，而政府与拆迁户之间的利益冲突，极易成为诱发社会问题的导火索。新拆迁条例实施之后，如何平衡政府与拆迁户之间的利益，的确是个值得深思的课题。

前不久，一位师长在与笔者聊天时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拆迁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拦路虎，如果谁能在经济补偿机制上找到解决方案，那么就應該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！”

在笔者看来，拆迁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，也是政府重塑公信力的重要契机，如果这个难题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，对于外有欧债危机袭扰、内有诸多社会矛盾交困的中国来说，不啻是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。基于此，我们的政府、研究机构、专家学者都应该行动起来，群策群力，汇才集智，为构建新型的、符合现代社会发展潮流的政府与民众关系积极求解！

联系我们

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，纯属作者个人观点，不代表本报立场，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。如果您想发表评论，请打电话给0755-83501640；发电邮至pp118@126.com。